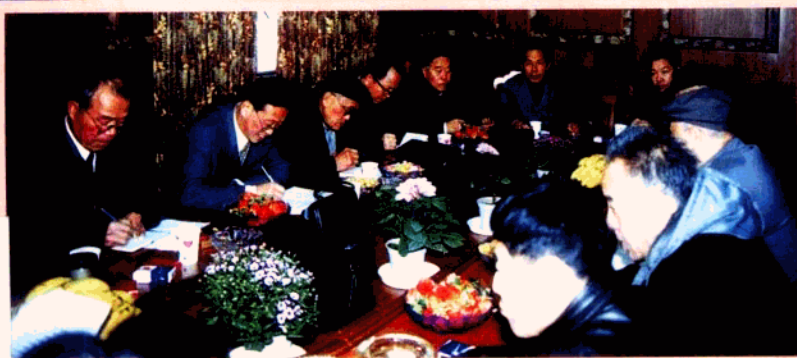




第十六期

鄞县新四军研究会 三届六次理事会议



鄞县新四军研究会编

二〇〇〇年三月

鄞县新四军研究会会刊

谭丕龙

鄞县新四军研究会
会刊
PDG

E 297.3-55 470 /v16

鄞县新四军研究会主办

会长:王雅根

2000年第1期(总第16期)

目 录

编辑:秘书组

审稿:张宪成

主编:鲁 刚

地址:宁波百丈东路251号

邮编:315040

电话:(0574)7334988-2214

(0574)7334988-3111

出版时间:2000年3月

封面设计:张宪成

回忆:

夏来根:抗粮抗税罢集市 (1)

孙锦堂:记华丰受降、解放泰安 (2)

项 耿:忆在浙东海上工作委员会工作 (5)

余文光:解放战争时期鄞慈三区对敌斗争的回忆 (15)

王元兴:罗部长肯定泗洲路派出所镇反经验 (22)

缅怀:

朱一松:纪念钟士康先生百年华诞 (24)

李 坚:跨世纪寿星在泗门陨落——哀悼革命姆妈罗爱菊

孙建英: (27)

鲁 刚:“土地菩萨”鲍纯甫 (29)

杨祥瑞:缅怀崔伟义烈士 (31)

会务活动

秘书组:本会第三届理事会召开第六次会议 (33)

王雅根:1999年会务工作情况和2000年工作安排的意

见 (34)

诗 词

陈少康:七绝四首 (37)

陈少康:浪淘沙·三首 (37)

许祖安:驳李洪志 (21)

人物春秋

严伟祥:出生入死为革命——严志相烈士传略 (38)

董玉艳:平凡而闪亮的人生——屠小花烈士传略 (41)

张宪成:人民卫士——徐永法 (44)

回顾与目标

秘书组:千方百计发展经济 开创鄞县跨世纪发展新局面
——政府工作报告摘录 (48)

简讯四则 (47)

抗粮抗税罢集市

夏来根

1944年4月，伪顽勾结在一起，敲榨勒索，欺压人民。我们乌岩一带山民都靠着挑毛笋、山货去换大米过活。水坪、夏家、董家、森林、王家、田引五个村山民隔天挑着山货、毛笋等去卖，换大米过艰苦生活。可是换来的大米每次被伪保长王宝云勒去。挑出毛笋、山货还加重税，每担毛笋和山货要交税10%，又逼得山民艰苦的生活也过不下去。

活捉伪保长打倒威风算总账

慈溪裘市镇王家，伪保长王宝云靠着日伪的势力，隔天把我们山里人用山货换来的大米都勒去，作为私有，害得山民苦生活也过不下去。这两件事，陈爱中同志来我家时，我作了详细汇报。陈爱中同志说：讲好话和恳求是没有用的，而且越求越糟，因为敌人是欺软怕硬的，只有斗争才能胜利，并叫我同群众商量跟敌人斗争的办法。根据陈爱中的意见，我和村里群众商量斗争的办法。其中夏和睦提出我们是穷光蛋，怕什么，伪保长是有很多田地财产，一吓他就怕。派几个青年去捉他，他会不怕吗？他又说：“来根，你带头好不好！”我说，“好！我带头。”裘市镇老板富翁很多，不给他们吃毛笋，我们大家暂时不挑毛笋上裘市去卖，广大群众会不骂他们？

商量后我又向陈爱中作汇报。陈说：“来根，你根据大家的意见，大胆去办，我会派人来裘市镇，你若认识来人！，你不和他打招呼。你办好了就算了。若办不好，他为出主意帮助你的。”第二天我又同大家商量。和睦叔提

出先捉伪保长王宝云，后不给他们吃毛笋、罢市。这二个办法很好，只要大家齐心，确定时间就是。推选出十二个青年叫我带队，随带绳子、扁担，当武器，走到王宝云家中，问宝云你大米还勒吗？宝云说：“你们有大米当然要勒！”我们十二个青年一齐动手，绑着王宝云走了四五里路，他家的长工追上来说：“有事可以讲的，人请不要捉到里山去。”他们也都知道，里山三五支队为穷人服务，威震四海，怕把人带到四明山，有去无回。我们说，“一定要捉去。”他说什么要求好讲。我们提出二个条件：第一把勒去的大米都要归还我们。第二今后不许再有人勒我们大米。王宝云狼狈地说，第一条我保证做到大米折价归还。第二条，我本人可以保证做到，可是别人勒米我难以保证呀？我只有去恳求讲情、做工作。我们一齐说，好！你写保证书来。他写了保证书给我们，我们就放了，他狼狈地回去了。大家都很高兴地说：“我们胜利了。”

抗税收罢集市

裘市镇是个大集市。周围廿里没有集市，人家多，生活上吃的东西全部靠到这个大集市来卖买的，特别在青黄不接没有别的素菜，只吃毛笋。我们按照已定计划，时隔二天，就停止毛笋进市。广大群众等着买毛笋，等到上午十时，市上仍不见毛笋入市。毛笋不入市群众大骂，特别是有婚事的人家，骂得更厉害。过了几天，我挑着少量山货去打听

(下转第14页)

记华丰受降 解放泰安

孙锦堂

浙东北撤部队在江苏涟水县整编后,继续向北进军。为了迎接新的任务,我们每天行军六七十里。当时的连队每排编制四个班,一个连有四个排,全连200人,有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大部队长途行军的确很疲劳,很多同志脚上打起水泡,走路一拐一颠,病号也多了,当然掉队的也不少。黄连长爱兵如亲兄弟一样,行军中常帮助战士背背包、扛枪支,有时连长身上背着三条步枪,同志们很受感动。部队越过老黄河时许多同志情绪低落,心里难受,说什么“不到黄河不知情,到了黄河出眼泪”。事实的确如此,我们长期生活在南方,吃穿等生活习惯与北方完全变了样,本来吃大米饭的,改吃麦粉,后来全吃小米饭,思想波动很大。经过上级系统教育和连长、指导员的深入个别谈心,战士们的革命精神又振奋起来。转眼到了1946年元旦,这时我们的队伍已到达山东老解放区、新四军军部临沂地区的莒县、费县,一路上锣鼓喧天,群众欢迎我军的秧歌队,村村都有,地方干部忙着为我们送粮、送柴草,妇女会组织了洗衣队等等。解放区人民热爱自己子弟兵的真情,真没话可说的。密切的军民关系,大大鼓舞了我们战士的革命斗志,纷纷表决心,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杀敌立功。

华丰受降

1946年1月初,部队到了兖州、泰安之间的华丰煤矿附近,接到上级命令,要我师配合协同兄弟部队包围华丰地区的日寇,并迫使

其缴械投降。这一消息传到,战士欢腾雀跃、斗志高昂,纷纷作好战斗准备,我连从东太平村一带出发,黄连长带着全连跑步赶到指定地点。这是一个小山坡,那里早有数匹战马,旁边站有几个领导干部,他们手拿望远镜,正在瞭望着。走近一看,原来是团长蔡群帆和政委张浪等几位首长和警卫员,我们都认识团首长。因为首长常与同志交谈,下连队检查工作,由此很熟悉。蔡团长个子很高,他身上穿着从日本鬼子那里缴获的呢军大衣,头上戴的轻型钢盔,胸前挂着刚放下的望远镜,好威武呀!大家向首长们敬礼问好,几位首长也向同志们问好。接着蔡团长当着大家的面,向黄连长交代任务,他说:“当前有3000余名日本兵,他们沿着津浦铁路北侧的公路上移动,经我兄弟部队二次谈判交涉,缴出了数门步兵炮和十几挺重机枪,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战斗,我们将计就计答应其要求,先收下他们的大炮和重机枪等重武器,放行过去。他们说:‘要把留下的轻机枪和步枪交给国民党,作为回日本的‘路费’……’。”接着蔡团长用响亮的口气问大家,“答应不答应”?战士们举起手中武器,一致喊了一句“不答应”!团长说:“那好,这任务交给你们,协同兄弟营、连,一起迫使眼前的日本鬼子乖乖地向我军投降吧!”蔡团长、张政委的简短动员,大大地鼓舞起我们的勇气。一月份,北方的气候已达到零度以下,夜里的霜冻袭击,使战士们冻得发抖,但想到要迫使小日本投降,每个战士的心里是火火热的。为了迷惑日军,我们

连与兄弟连一样,不时地从东拉到西,从这个山头又去占领那个山坡,有时还使劲挖筑工事。有时跑步穿插在公路两侧,弄得日军胆战心惊,更加害怕。我们实际上已团团包围了这股日军,并也有足够的力量消灭他们,但还是迫使他们放下武器为上策。经过领导机关强有力的谈判,小日本无奈签字投降了。这时各级领导下令要我连迅速到公路上收缴日军武器。只见日本兵沿公路一线,有低头弯腰坐在地上的,也有干脆倒地上睡觉的,有的双脚不断地跺踏着,大概他们脚指冻僵了,但大部份士兵从村庄上拿来高粱杆和麦草烤起熊熊大火取暖,晚间公路上成了长达数里的火龙。这时敌人已将枪支架在一起有序地堆放着,地上放着手榴弹、刺刀、皮盒式子弹带及所有军用物品。我们收缴的日军武器很多,日本士兵笑嘻嘻地伸着大拇指,表示对我军敬佩,也有少数的黑着脸的日本鬼子还不服气。但在强大的我军面前他已成了败兵,绝大多数日本兵对结束这场罪恶的侵华战争,能留着一条小命回日本去已感到非常幸运了。在接收日寇投降的现场上,到处可以见到日本兵一副狼狈相。日本鬼子的失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为死难同胞报了仇,我们每个战士的心情是多么的高兴啊!

解放泰安城

华丰受降后,我们继续北上。1946年1月上旬,到达全国闻名的五岳之一泰山,我们奉命包围泰山脚下的泰安城。这里驻守着伪军宁春霖部的一个旅,约3000余人。宁春霖跟随日本鬼子经常出城烧杀、抢掠,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当地百姓恨之入骨。泰安人民在当地政府的大量宣传下,了解新四军和八路军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都是热爱人民的。听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来了,都高兴极了。我团到了泰安城外,团部驻在岗寨,三营和我连住在城南约五六里路的南

官庄村。我们八连还派出一个排在城南关街头(靠城门口)作为监视哨所。泰安城北紧连泰山,北部有我纵兄弟师控制包围着。泰安西关是火车站,非常热闹,这里由第九团守卫着,津浦铁路大动脉贯穿我团驻地的西首,泰安北面是济南省城,我军包围泰安城对当时的国民党来说影响很大。为了和平,我军执行党中央对泰安城围而不打的命令。当时的部队展开了百日大练兵,同志们紧张地学习刺杀、投手榴弹、实弹射击比赛,还进行了实战演习来提高战士们的杀敌本领。在停战期间,除紧张军训外,上级领导还抓紧政治学习,揭露蒋介石真内战假和平的阴谋,特别是蒋介石的后台老板美帝大肆将美式武器装备国民党军队。同时部队中还开展了诉阶级苦、诉蒋介石总后台的苦,来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我们部队还在驻地开展军民一家人活动。这时正好是麦收季节,连队每天帮助群众割麦子,老百姓要我们吃饭、吃点心,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部队严格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建起了军民一家人的紧密团结关系,新四军威望在山东人民中树立起来。

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公开下令调动国民党大军全面向我解放区发动进攻。遵照毛主席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部队接到上级命令:“迅速解放泰安城”。1946年6月7日晚上,我八团三营营长李一群同志亲自带领八连向城西南猛攻,并很快攻占了电灯公司一带街巷,我连占领了民房制高点,监控城内之敌。8日上午,我们六班奉命派出一个战斗小组,在城墙脚下附近民房、巷弄搜索潜伏残敌,我三人不慎走到了一个敌设置障碍物的死胡同,一时密集的枪弹、手榴弹向我三人袭击,手榴弹连续投来10余个,炸得我三人满脸鲜血,身上也受了多处伤。组长周望高要我与冯正炎迅速滚到墙脚下的臭阴沟里去,防护自己。六月天的臭阴沟真使人难受呀!小虫密密麻麻钻在

身上往肉体上乱咬,臭气使人恶心,一边战斗又在激烈进行着。我三人机灵地将敌甩过来的手榴弹还未爆炸之前,又投了回去,并及时拿出自己身边的手榴弹回击了敌人。由于我三人密切协同作战,敌人向城墙底的暗道里逃回去了。这时,班、排也派战士前来支援接应,连长通讯员金荣华同志也及时赶到,命我三人迅速撤回,说地形对我不利,避免伤亡。下午,我六班坚守在城墙下一座房屋暗处,以冷枪射击城墙上之敌,效果很好,击毙击伤数名敌人,受到排连领导表扬。在枪眼射击孔上班长骆军生同志不幸中弹牺牲,不多时,传来消息,连长黄茂春同志在制高点(房顶上)指挥布置轻机枪准备进攻,压制敌人火力时,不幸被敌人冷枪击中,光荣牺牲。全连上下报仇的决心更旺盛,纷纷向上级请求参加突击排、突击班和小组,杀进城内去要为黄连长、骆班长报仇。6月10日下午,进攻泰安城的命令下来了,各营、连的作战攻击部队在强大的炮火、轻重机枪猛射掩护下,一齐拥向城墙下的护城河(污水)里,突击队员,身上披着浸湿了的棉被。我和周望高、冯正炎三人是

突击组的先头尖兵,我们向高达十几米的云梯冲上去。这时云梯二侧有代连长钱永才和指导员王一飞等领导和战士不停地护送着我们,护城河里敌人丢下来的手榴弹不时爆炸,敌人的子弹声吱吱地飞啸着,我三人右手紧握手榴弹,左手抓云梯,很快登上了城墙。我们一阵投弹,打开了突破口,占领了敌阵地。按照规定,我们不停地向纵深扩大战果,敌人吓破了胆,一路上纷纷缴枪投降,足有200多敌人口喊饶命,跪地投降。为了乘胜追击敌人,我们先头突击班组,顾不了许多俘虏兵和战利器,还是一直冲、冲、冲,一直占领了泰山脚下的岱庙,那里我们打开敌人的牢房,救出了十几个被敌人抓去的难友。当时我师有一支歌,“……战斗不到5分钟,泰安城上红旗飘。”象征这次攻城战士速度快。经统计,除宁春霖本人带着少数人逃出外,被歼伪军3000余人,缴获了全部军需物资。我们为牺牲的烈士报了仇,为山东人民除了毒瘤。

黄茂春同志,安息吧!你的英名与泰山永存,人民永远怀念您!

(上接第30页)

好接待和掩护,决定鲍纯甫等二个同志坚持慈南。在鲍纯甫的领导下,接待了上海来的地下党员、革命青年、工人和各地的交通联络员共20多人,把他们安置到芝林山上的公馆里隐蔽。当时,敌人集中兵力在慈南和鄞西边界反复清剿搜查,派巡逻队在各地巡逻,在芝林、竹丝岚、袁马三村建立据点驻军,形成鼎足之势,对我跟踪追击。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鲍纯甫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胆魄、良好的群众基础,把20多位同志安置在敌人据点的眼皮下的芝林村后面的山上密林里的公馆(草舍)里,吃的粮食和咸菜都是动员芝林村基本群众、孙阿娥等积极分子送上山的。一个多月之后,把

20个同志安全地、一个不少地送交临委分配工作。为临委召开各种会议做好生活服务和安全保卫等工作,使每次会议顺利进行。因此,同志们给她“临委副总管”、“联络总站站长”、“后勤部长”和“保卫处长”等荣誉称号。

四、进行建立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1948年下半年,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和浙东游击根据地迅速扩大的时候,中共浙东临委决定划出鄞慈县第四区(慈南)部分乡建立临委直属实验区,鲍纯甫任区委副书记兼武工队队长,他领导发动群众建立基层(乡村)人民政权和农会、妇女会、民兵自卫队等群众组织,为临委在解放地区建立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提供经验。

忆浙东海上工作委员会工作

项 耿

到上海建立“小海委”

1948年6月,顾德欢同志找我谈话,临委决定建立浙东海上工作委员会,指定我为书记,林有用、洪舒江为委员。我实际上已在做“海委”的工作,公布“海委”的组织名称并有了集体的工作班子,力量大了;同时,顾德欢交给我一件去上海的任务。此时,王起、王博平、马平同志都在慈南的“公馆”里。在山上,王起同志约好与我在上海见面,由王博平和我约好见面地点。然后,各走各的路,分头下山,上海再见。为防意外,忌走老路,不出潘岙。与“阿五哥”(鲍纯甫)商量,他叫我走大隐那条路。阿五哥派人把我送到“阿姐”(蒋惠菊)那里。翌晨,大隐出发,经梁山伯庙、望春桥,进西门,到阿华外婆家,望望外婆,到下午时间,购轮船票上轮船。到上海,找到王博平亲戚开的柴爿店。王博平已在店里,共进午餐,他告知我,王起在马路上约见我的地点时间。我只好到浦东大厦去住了一宿。第二天,在辣斐德路(现叫复兴中路)上见到王起。会晤后没谈什么,王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他头戴铜盆帽,帽沿压得低低的,低着头走得很快。走进一家座北朝南的俄国小餐馆吃饭,平生吃了唯一的一次罗宋餐,有罗宋汤、土豆烧牛肉……。饭后,出餐馆拐入一条南北向的大马路,左侧马路旁有家小工厂,王迅速朝里走。来到一间工场兼客厅的房子里,见到一位50来岁的男人。王上前与他轻轻地讲些什么,那人便惊慌地催促我们快走,

说:“刚刚还有人等在这里呢,刚出去吃饭,你们快走,快走!”我们知道这里已经出了毛病,已有特务坐候。便转身急出厂门,左手转弯,紧走一阵,坐上路旁三轮车,没讲去处和车资,向外滩方向一指就起程。在车上王讲了一个路名。转了好几个弯,大概在宁波路口停下来。尾巴肯定已经甩脱。走了一段路,王才停下来告诉我和洪舒江联络的地点、时间和方法。我们就各自分开。可是到那小工厂去是找什么人,办什么事。虽然以后我和王起多次在一起工作,从未谈起,我也从未问过不该知道的事就不问,这似乎是地下工作的规矩。可是这是谜,宁波党史更失去这个资料,可惜!

次日,我如约到八仙桥龙门路,手拿一张报纸,《新闻报》三个字露在外面(接头的记号并表示没有尾巴)边走边佯作看商店橱窗来回几趟。对面马路,洪舒江出现了。他身穿长衫,头戴铜盆帽,脚穿皮脚,戴眼镜,风度翩翩。手中也拿着一张《新闻报》。对着了,我穿过马路问:“你是洪先生吗?”他答是的,反问我:“是陈先生吗?”双方都很高兴互相紧握手。我们坐了一段路的车,又步行一段路。我跟着洪走,这路我越走越熟悉,是我青少年时常走的路到了,原来是陆家浜路三角街(我原叫南码头)一爿石灰行,洪住在楼上右厢房。洪家从此成了我们“小海委”在上海的联络点。林有用同志因为上海警备司令部通缉他,无法露面,以后到苏北去了常驻于苏北。上海这方面就是靠洪舒江同志了。上海市区

的、浦东的、浙南台属的都找小洪，他有办法联系上。从此，我到上海也无需再去冒险住旅馆，住浦东大厦。住在小洪家十分安全，还可以吃到小洪的拿手菜红烧肉。没有给小洪活动经费，没有工资，更没有奖金，是做赔钱的冒险工作。这又是一个白区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从此，”小海委“正式运转了。

第二次上舟山

在慈南“复仇公馆”，顾德欢同志要我到舟山向王起同志传达工作意见，怎么能找到王，顾派林秀梅（又名李辉）同志陪我去。林同志说一口道地的宁波话，聪明机智，落落大方。解放后，李辉曾在省委组织部工作。当时为了避免途中发生意外，虽然是同志同路，同执行同一任务，还是各走各的路，各找各的门，到了舟山本岛，再一起行动。

我这次出去，为绕开高桥鄞警据点，不乘航船；步行经过望春桥进入宁波住孝闻街阿华外婆家。外婆对我这个做“生意”的阿根哥已经非常熟悉。她受外甥何华委托，热情接待我。我向她递烟，叫外婆，对她很孝敬。住了一宿，翌晨到江北岸搭“鄞余镇”小轮船起程。船出镇海口，到金塘洋面，风浪大，船颠簸厉害，我感到非常难受，头晕呕吐连胃液黄水都吐出来了。盼望快到舟山本岛。

轮船进定海港，港湾内帆船云集，岸上人来人往，我准备过上码头的检查关。注意力集中到码头上的敌人动态。码头上有不少的“黄衣裳”、“黑警服”，那黄帽子黑帽子下面的脸，都是绷得紧紧的，露出凶光的眼睛向着旅客扫视，拥挤的旅客上码头时，他们审视每个旅客的脸色，又紧盯手上拎着的行李，发现问题个别盘问。我上码头之前，先点燃一支香烟，叼在两唇之间，若无其事的样子。上码头不前不后，嵌在登岸旅客的高潮里，蜂拥而进，融入人流。群众虽无意其实掩护我顺利地过了这一关。其实过哪一道码头关都是如此。革命工作必须依靠群众。

见到前面林同志就跟着她走。进入街头住宅区，林同志熟路又熟门，跨进一个一楼一底人家。主人也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女青年，林称她大叶。大叶也是落落大方，一见如故，热情招待，大声讲话，尽情欢笑。又出来了小叶，比她姐姐文静腼腆。她们的父母都是胖乎乎的颇有福相。大叶斟茶，小叶递毛巾。我敬烟给她们的父母，大家寒暄一番。过了一会儿，她父母、小叶都心照不宣地先后借故离开，让我们好谈正经，看来已有不少像我这样的客人来做客。林同志向大叶说明来意：要找王起，在大叶家吃饭住宿。第二天，大叶告知我到岱山联络点的地址和联络人的姓名，林同志留下，不知她还有什么任务。我就起身出发，大叶送我到门外。大叶同志为了革命被敌人逮捕英勇不屈，光荣牺牲。我与她见两次面，这是第一次。

轮船将到岱山岛的高亭，我又提高警惕，点燃烟叼在嘴上，准备过关。注意码头上，没有“黑衣裳”，有两个“黄衣裳”。他们与定海码头上的不同，他们对上岸的旅客漫不经心，却与码头上的老百姓谈得很起劲。好像是例行公事，摆摆样子的，没有检查任务似的，这个关口很容易过去。

我的目的地是东沙角（大集镇区署所在地）。去东沙角的旅客不少，我跟着走。路右是山，远看光秃秃，近看树稀稀。左边是一块大盐滩，滩外是大海。大路、盐滩、浩海、青天、阳光，令人心旷神怡。过了三个有国民党军警人员把守的检查关，联络点就在前面，心欢脚快，这二三十华里的路程不在话下，一会就走完。到了东沙角，问到了座落在山脚下的王先生的家。王恰恰在家，顺利极了。王身材魁梧，方脸红润，下穿黄裤，上着便服，西式衬衫，好像是吃“公事饭”的，墙上挂着人像针灸图，又好似针灸郎中。

“王××先生是这里吗？”我问。

“是的，是我”，王毫不迟疑地回答。反问我：“尊姓，从哪里来、什么事？”

我说“鄞姓陈，宁波来，找詹步行先生，他在哪？”

王就请我坐下，指着门前的大路，热情地说：“就朝这条路，一直走，没多远，到念姆乔路口，有只卤咸货店，老板就是詹先生”。

我道了谢，就赶路。边走边想，这位王先生的联络站，挺爽快，不大像地下党的做法。也许在我来之前他已得到内部通知。

到了念姆乔，路旁就是一片杂货店。寻到店，急于找人，正想开口询问，那人一抬头，是张熟悉的脸，不用问了。原来詹步行者就是抗战时的詹胜之，是我1939年当青年支部书记时的老领导。一对熟人久别重逢欣喜之情不言可知。我急问王起同志在哪？詹未及作答，从里间房门出来王起同志，我与詹的对话他已经听到。

我当即向王起同志传达顾德欢同志的工作意见，主要是：“上级要我们发展敌后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扩展活动区，开展群众工作。加强直接掌握的那支武装的领导，与舟山游击支队取得联系。”等等。王起同志表示立刻研究执行。此意图，王在四明山时本已知道，这次无非是催促实施罢了。

我住了一天，新认识一位周先生，大家嬉称“周老头”。这位“老头”脸无皱纹，鬓没染霜，是念姆小学的青年教师。他诙谐风趣，一见就熟。他就是余力行同志，以后是东海总队队的政治处副主任，解放后在南京军区工作。

我在此发现，一向谨慎的王起同志行动似乎放宽了。联想高亭码头上“黄衣裳”的漫不经心、东沙角的王先生直接爽快的联络法，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岱山区署的眼皮底下竟能这样地生活、工作，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奥妙。按党的保守机密的纪律，想管想，不该问的事是不应该问的。解放以后，才弄清楚这个谜底，原来当时岱山区的区长（兼保警队长）王家恒，是中共地下党员。在王的辖区内的地下党，游击武装部队的活动，受到王的掩护、支持。这就是敌占区内，革命武装能生

存、能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

再到上海和林加晶、吴建功联系

同年夏末，顾德欢同志要我到上海去，联系林加晶同志（顾的爱人、抗战时三北地委秘书，因地委机关常在慈北区活动，我任慈北区委书记，故认识。解放后，省妇联负责人），联系吴建功同志（抗战时，任慈镇县办主任，第四支队支队长。解放后，松江与暑副专员）。

走大隐那条路，出大隐山口，沿姚江附近大路走，过梁山伯庙门前，经望春桥，进宁波西门，到江北岸码头，搭轮船。睡一觉，翌晨就在上海了。十六铺向南，就到洪舒江同志的家，洪舒江是“西装瘪三，自家烧饭”。洪的衣着，有时长衫、有时穿西装，但不是瘪三。洪的南汇老家，门庭有气派，兄弟三人，是读书人，都是革命者。“自家烧饭”确实如此，而且能够烧出“道地”的菜。他的拿手好菜红烧肉，还会引出我的馋涎。1997年我在杭州，还到洪家吃过一次。

通过小洪约见林加晶同志，在金陵路冠生园楼上小吃部会见。边吃边谈，以拉家常的口气传达顾德欢同志的话，旁人听到也不会懂真正的意思。我说：“张（即顾）先生很好。家里的情况也很好，生意准备做得更大点。小娘舅（即林枫同志，上海市委的。解放后，曾任杭州市委书记）的事情好办了（什么事，那是顾林约定的）……。你看什么事情需要告诉张先生的？”林没有谈什么，会见就这样结束，各奔东西。

与吴建功同志的约会就复杂了。小洪先与吴约好，然后，洪把我带领至一个地方。但洪事先没有告诉我是什么路。我跟着洪走。洪领我去的路，我是很熟悉的路。叫警厅路（20年代叫道台衙门，1927年3月以前是军阀统治时的上海市的警察厅。我生长在南市大东门内，与警厅路毗邻）。1927年的“四、一二”事变，这里曾经是镇压革命的反革命大本营。由反动军警押解着的，用绳索缚着二三

十个革命者(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者)一串串地,从我家门口经过,押进警客厅。再由此分发到监牢里或龙华、南车站电厂后面枪毙、杀头。没想到21年之后,小洪竟把我领到这个地方。地方还是这个地方,不过外形已经改观,“衙门”不见了,改建成钢筋水泥一幢幢的办公房。小洪把我领进一间办公室,有一个身穿挺括面料的黄军装的国民党军官坐在办公桌前。小洪介绍对方叫茅英(又名茅铸九),小洪就走了。茅把我领进另一间无人的办公室里,给我几张报纸看,等他下办公时间一起走。我坐在这里感到很不自在,报纸里的新闻根本看不进去。又感到好笑,这里曾经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如今我这个共产党员竟坐在这里做革命工作,反差何其大啊?我度时如年,好不容易在魔窟里熬过了两个小时,茅下班了,走上中华路,两人同坐一辆人力三轮车,到沪西某地茅家。茅把我安排在三层小阁楼里,晚饭以后我就躺在那里,听到楼梯响起几个人的脚步声,原来是茅英陪同吴建功、储贵彬同志来了。我坐在地铺上,他们三人站着,这就是我和吴建功同志在上海的会见。

我问他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带回去的?他们说:“没有,可以对张部长说我们好的。”

这样的联系,看似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其实见到面寥寥一句话已经解决了浙东临委负责同志关心的重大问题。因为吴建功同志实际上是与同时离开四明山的,他到上海执行重要任务。我们见了面吴只说了“我们好的”,这句话就已经够了。这说明吴建功等同志安全到达上海,说明执行任务没有遇到特大的麻烦事情,也说明了与我们海委建立了联系渠道。

这次和吴建功同志见面后不久,储贵彬同志执行浙东临委的决定,率领南汇县大团自卫队渡钱江,上四明山打游击。

小洪陪我到南市某街道,见到刘路平同志(大团自卫队政治教官解放后湘湖师范负

责人)。认识了他在上海的家,这也是为“海委”创造工作条件。

下慈镇、渡舟山

7月,到慈镇县工委传达领导意图,并了解情况。去时,随慈镇的武工队员过姚江,经洪塘东面进入慈东的黄沙站。该联络站负责人是胡玉林、余百英同志。这是平原的农村,他们叫我白天住在田野的瓜舍里;晚上,由同志陪同上慈东山区,找到县负责同志赵士炘,传达的主要内容是:革命形势发展,要求慈镇加强经济工作,以支援大山区革命发展中的军需。加强与四明山及各地的联络工作等等。赵也向我谈了慈镇的情况。

返程走合法路线,从骆驼桥乘长途汽车转宁波,上四明山。以后,我到上海、舟山去,为了顺带传达上级对慈镇的工作指示或向慈镇要我外出的川旅经费,因而我常到慈镇转转。到黄沙站至少两次,后通过叶靳同志关系,与漈浦鱼行建立联络关系,不再去黄沙站。后该站受到破坏,余百英同志被捕。黄沙站,地处平原,离骆驼桥市镇汽车站近,联络站进出人比较多,虽然群众基础好,可也难免给敌人发觉。为了革命工作需要,把比较安全的村外田野瓜舍让给我们这些客人,而把危险留给自己。这种精神令人敬佩,在敌后斗争的战场上,具有这种精神的同志不仅仅是余百英同志。不久,到舟山去向王起同志传达任务。我还是先到舟山道头的大叶家。这次不住大叶家,她安排我住她父亲工作的鱼行的客房里。这样安排比较好,使她家里安全一点,我可以多一个歇脚点。翌晨,我离开道头,乘轮船上岱山。没想到,这次与大叶的分别竟成了与大叶同志的永别。不多久,就听说叶被捕牺牲。44年以后的1992年6月,我到舟山街头市容改变,找不到大叶的家门,也见不到半路亭小学的痕迹,(叶氏两姐妹教书的学校。)访故有诚意,旧址无觅处,留下怀思绵绵!

船到高亭上岸，步行直奔东沙角念姆岙舟山党的领导机关，只见到詹步行同志，二哥（王起）、小王先生（王博平）、周老头（余力行）都不在。詹弄来一只小帆船载我漂海到秀山。

一踏上秀山，精神为之一振，见到了党直接领导的武装部队——东海游击总队。那时刚取得“望亮尖”战斗的胜利，军威大振，士气旺盛，群众和部队关系亲和。这里是我们的天下。王起同志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管政治工作的正副主任王博平、余力行，大队长王云轩、副大队长江之铭、何××，中队长我只认识一个，那就是李旦雕同志，“独眼龙”高瘦个子，穿黑色短衫裤、内衬白汗衫、头戴礼帽式金丝草帽，胸前斜挂木壳枪，有草莽英雄的气概，胆大、豪爽、机灵，是个勇敢的年轻军事干部。

我向王起同志传达的顾德欢同志的工作意见，主要是三方面的内容：

1. 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要加强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武装，发动群众，两者不能忽视其一。

2. 注意开展上层人物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3. 注意筹措军需，开辟经济来源。

部队转移宿营地，游击队总是夜间行动的。东海乘小帆船夜航，对我来说有点新鲜味。夏天天气闷热，躺在小小的船舱里又闷又腥，这个味道实在不好闻、不好受。好不容易挨到了宿营地，上了长白岛。踏过沙滩，从淡水池旁边循石级而上，进入一个小渔村。群众与我们部队的关系是好的，这里是个比较隐蔽的老宿营地。海岛与四明山不同，只要群众工作做得好，军民关系好，敌人是不容易发觉我们的。如果群众基础差，渔民打鱼卖鱼到处跑，宿营地难免会暴露，遇到兵力优势的敌人围攻，打被动仗，那就比山地战艰苦得多了。

我们刚进屋，安排好住房，暴风雨紧跟而

来。海面漆黑，飓风呼啸，暴雨倾盆，海浪卷过沙滩，还是一个劲地朝上猛冲。我忽然悟出一个道理，这个淡水池做在这里的半山腰是完全正确的，张牙舞爪的恶浪只能冲到水池的基座下边，冲不进池里，水还是淡的。这个准确度是群众实践的结果。

忽然，岛的右前方的黑幕里闪出一个微弱的灯光，摇摇晃晃地向长白岛渐渐靠近，却总是靠不拢来。有同志判断，船已失去控制（桅杆折断）。灯光竟向岛的右侧海面移动，向左侧伸出的礁石群边靠。礁石像虎爪狼牙，渔民兄弟的生命危在顷刻间。东海总队的指战员们，伫立在狂风暴雨中，注视着灯光的动向，担忧着渔民兄弟的遭遇。灯光不移了，只在原地晃动，船搁在礁石堆里了。蓦地响起“救命啊，救命啊……”的凄厉呼叫声。两位同志毫不迟疑，自告奋勇驾起一只小小的舢舨，冒风雨、劈波涛，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线，摇着橹，艰难地向着礁石群灯光闪处驶去。好久，小舢舨回来了，触礁船上的渔民兄弟得救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质在暴风雨的东海黑夜里闪闪发光。也许，这两位可敬的东海好儿子，若干天以后光荣牺牲在六横岛战斗的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屠刀下。他们为人民的革命精神和人生价值将与东海长存！

飓风过后，我向王起同志提出想返回四明山。王叫我再休息几天。恰逢王博平同志要到别的岛去进行工作，我就和他一起行动。

那晚，起锚扬帆，船到倭井潭岛。船近埠头，岸上有军人吆喝：“哪一个，哪里来？这边回答：“小王先生”，那边不问了。埠头旁黑蒙蒙一个建筑物，大概是碉堡。我们沿石阶而上。一家体面人家的屋里，原来是保长家，王把我这位“陈先生”介绍给保长，说明只住三天，要他好好照顾。王对我说明，这里是我们能控制的地区，“保警中队”、保长都听我们的，三天以后，他来陪我出去。第三天，王如约到此，一起趁渔船到舟山本岛的钓门，住在

一家鱼行里,老板对我们很客气。次日,我从钓门出发,穿过定海县城,经过半里亭道头。白区工作没有必要就不得发生横的关系,我没有找大叶。趁轮船转宁波回四明山。

再次到舟山

1948年8月,顾德欢同志叫我到舟山去传达重要决定。我到宁波乘“鄞余镇”轮船直达高亭。先到詹步行同志家,再趁渔船到长涂岛找到在东海总队的王起同志。

这次决定的中心内容是:要东海总队的活动逐渐向西南靠,创造条件,伺机在象山港虾峙一带登陆,把部队迅速拉上天台山或四明山。与山上部队会师……。四明部队准备到天台活动……。

这是浙东临工委对舟山革命工作的又一个重大决策。

这年的6月中旬,林枫与顾德欢同志研究部队的今后行动,“以浙东为中心,把分散的地方武装逐渐形成基干力量(主力)在不妨碍坚持原有山区之游击战争,集中力量打开台属局面,俟自己力量达到相当程度,第二步即分出力量开辟闽浙赣老苏区根据地,准备在主力(大军)尚未到达之前,就能形成游击根据地或小块解放区。部队必须到敌人空隙的地方点火,发动广泛性的群众性的游击战,跳跃式的向前,力求面的发展,不要把中心力量老是在老的地区与敌人纠缠不清,要把内线的纠缠防御局面,变成为外线发展的进攻局面……。决定钢铁部队跳出内线,南进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台属地区去。”

浙东临委决定,东海总队离海上山,是实施上述浙东的发展战略意图的重大步骤,临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果断的。可是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大毛病。1948年初冬,王博平在苏北告知我,东海总队向舟山西南行动时,在六横岛受到国民党海军的攻击。战斗中,总队指战员表现很英勇,终因寡不敌众,多数军事干部和战士壮烈牺牲。

我传达后,得到王起同志“坚决执行”的答复。我仍然回到念姆岙詹步行同志家里住了两位客人,男的汪先生(徐朗同志)、女的小葛(葛维凤),两口子因为宁波地下党出毛病,来舟山“避风头”。碰巧不约而同,汪、葛俩竟和我同日同乘“鄞余镇”轮船返甬。两口子坐在前客舱,有茶水,派头大点。我为隐蔽点,坐后面统舱,没有茶喝,坐长板凳,同舱还有两名警察。轮船驶到金塘洋面,出了一件意外的事。在船尾1000多米的海面上,出现两艘机帆船,它们边西行边朝“鄞余镇”打枪,枪弹打在甲板上发出声音。舱内客人乱作一团,多数客人躲入下层底舱,坐在最后排的两个警察紧张地迅速剥掉黑皮、连同警帽抛进大海、钻入机舱。我蹲身隐蔽于装货的木桶旁观察动静。“鄞余镇”船主本想开快车摆脱后面机帆船的追赶,船速过快,轮机发生故障,被迫“插蜡烛。”枪声停息,两艘高大的机帆船紧紧地夹在中间。从机帆船上跳下来几个佩短枪的人,其中一位就是“独眼龙”李旦雕中队长。他进舱就出安民布告。大声说道:“各位旅客不要惊慌,我们是新四军……”。我怕暴露,把金丝草帽的帽沿压着眉毛头低低的。李等人到前舱、后舱底舱转来转去寻觅点什么。我处境十分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有位在秀山岛上曾为我安排吃饭睡觉的同志,他见到我,非常热情憨笑着蹲在我的长凳旁,把手榴弹放在舱板上,亲昵地问我:“你也在船上,到宁波去吗?”真使我哭笑不得。答他吧,怕船上人看见,难回宁波。不答吧,自己同志当作陌路人于心不忍。最后,还是理智战胜感情,忍了心,咬牙闭眼说:“不认识你。”他见我如此冷淡,无奈怏怏地离去。也许,这位同志牺牲在六横岛上。他留下英名,我却留下遗憾!后来才听说,原来是东海总队得到岱山税警缴税款的情报,李旦雕等是来拦截税款的行动,不料税警把装税款的麻袋移藏在底舱的轮机房里,李旦雕等既没有找到麻袋,也没有找到解税款的警察,反而

暴露了新四军的面目,引起群众的误会。李旦雕的工作作风太粗鲁了。

二上苏北

1948年9月,顾德欢同志又派我到华中去要干部。我带去第一次上苏北要求调干的名单,又征求了陈布衣等同志的意见,再带去一张新名单,其中还有女干部。这时形势好多了,浙东有了不少的女同志。

顾调派给我四名“海委”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位吕健民同志,启东人,新党员,先施公司职工,因搞工运面目暴露撤离上海到了四明山。顾说带了他,便于走苏北的合法路径。顾又嘱咐我要与上海的白道同志联系上。白道即俞圣棋,他与爱人陈敬之都是大学生,是台州地区的上层人物的子女。听说解放前夕,我浙东游击纵队攻克天台、解放三门,他们起过相当大的作用。解放初,白任三门县副县长。联系上白道,以备今后我上天台山之用。说明顾已准备亲率部队开辟台属地区。

我和小吕分别下四明山,我经鄞西半山林时新同志家,出山到宁波,到了上海再会面。为了在上海增添一个立脚点,并了解小吕的家庭情况,我先住小吕家,再住小洪处。我和小洪同到南市蓬莱路,在一个石库门的二楼见到了白道、陈敬之,建立了到天台山的关系。

我与小吕到十六铺乘长江轮船,翌晨到了青龙港。上码头时,有许多国民党军警人员检查旅客,幸亏上次我在华中工委搞到一张别的同志的“上海市市民证”,这张半真半假的身份证今日派了大用场,帮我顺利通过了进入苏北的第一关。进入海门市场,我们以贩卖香烟的商人出现,购买了一批香烟,雇了一辆独轮车。可以一举三得,一掩护我们的身份,二等于找了向导,三卖掉香烟可以把蒋介石的法币换成解放区的抗币。我们先与推车者说到汤家镇。汤家镇是敌我来来去去

的游击区,离青龙港二十华里,是汇龙镇敌军经常出来活动的危险地带。走这个阴阳界必须百倍警惕。而且这段路上,是在高粱玉米地的“青纱帐”里走,视线经常被挡住,如果前面有敌军过来,就会狭路相逢,无法回避,特别危险,是道鬼门关。我们正走着,在一个转弯角处遇到一个老百姓,他好心地警告我们,说:“汇龙镇(据点)的黄衣裳出来了,你们快躲一躲。”我们急忙转进“青纱帐”的小泥路,隐蔽在一家低矮的独立的草舍内。半晌,听房主人说,敌军已经过去,并说有个路过的人身上被“黄衣裳”抄出抗币,惨遭活埋。这趟我们进入解放区之前,能够过得两道关,靠的是群众。群众并不知道我们的政治身份,他们出于对反动派的厌恶、痛恨,才自然地帮助那些进出解放区善良的人们。

我们走到汤家镇,进入茶馆喝茶休息。向东十里,聚兴镇那才是解放区了。我们与车工商量,请他继续送我们到聚兴镇,他爽快地答应了。九月的苏北,天上骄阳似火,地面“青纱帐”冒出来阵阵热气,尽管很热,过了汤家镇似乎天分外明朗,地分外开阔,空气分外清新,脚步分外轻。这十里路,很快就过来了。把香烟都卖给聚兴镇的公家商店,换得抗币。美滋滋地吃了一顿晚餐,当晚宿在镇上,睡个安心的好觉。次日继续东行,在农村的一幢楼房里,找到启东县委书记,向他说明来意,要求给我们沿途的证明书。在县委机关歇留时,恰巧碰见同住华中工委招待所的江南干部浦同志(坚持苏南撤退到苏北的昆山县县长)给了我们通行的证明书。我与小吕从此北上,从长江、黄海接合部的隅角出发,沿着黄海的西海岸的小道(绕开沿海的敌港敌据点)步行北上。天气炎热,经过山地红军锻炼的腿脚也只能日行六十华里。经过滨海许多大小镇,什么六甲、巴掌、洋河等等,进入盐碱地区。这里不长庄稼,只长茅草。百里无人烟,蓝天白日下,却有蚊子追着叮吮人血,找地方吃饭难、住家难。穷途逼人奋进,

努力加速走出盐碱区,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小茅舍,才解决吃住问题。

那时,正是解放益林战役之后,华中工委已经住在合德镇上,二纵队也在这里,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兼二纵政委。二纵队韦国清司令做报告我也听了,二纵文工团演出《升官图》我也看了。这是讽刺四大家属的话剧。我经过城市化装用的那双棕色旧皮鞋,还被文工团借去当作道具,为那个大腹便便的“孔祥熙”老爷足下效劳。这时的合德镇相当繁荣,人来人往,有挑担的,有手提农产品的,有推独轮车的,有推自行车的……。街上有机关,有供销合作社、有银行、有新华书店、有饮食店旅店及其他各种商店。在合德镇上,我认识了两位浙江老乡,一位是忻元锡,舟山人(注:鄞县人)解放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一位是张建忠,余姚人。

我通过华中工委秘书朱志英同志找到管文蔚司令员(他兼江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向他提出调干的要求。管叫我找华中工委组织部联系。我找到王坚同志和沈干事(浙江诸暨人)。他们要我提名单,我交出浙东带来的两批名单以后,两位同志告诉我,已在华中工委的有陈子方、薛诚、潘林儒同志,有些同志不愿提前回浙东,林有璋同志已牺牲。与工委领导商讨结果,先给陈子方同志(抗战时上虞县县长),陈愿意立即到浙东,不过先得在上海看病。

去是两个回来只多一个陈子方同志。走原来的老路天气凉爽得多了。我们在合德镇,华中的后勤部门准备夹衣,放在旅行袋里,仍到启东县委,要求县委派敌工科长帮助我们安全出境。我们跟随科长和助手一起到汤家镇。科长得到情报汇龙镇的敌人出动,科长带领我们到汤家镇以西的一户农家住下来。汤家镇方向有枪声,我们一夜没睡,坐以待旦,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拂晓我看到南面的大路上,有老百姓向青龙港方向走动。我们到此的目的只是为了通过“阴

阳界”到达青龙港乘上海轮船,既然这里已经发生敌情,坐等在这里有害无益,还是冒险出发,会同老百姓一起进青龙港。我决心下了,征得陈子方的同意,就辞别科长,出门上大路,遥随着老百姓走向青龙港。事物是辩证的,敌人在沿江的游击区的活动越是猖獗、频繁,接近敌占区的地段相反倒是比较平静的。我们出乎意料地顺利通过青龙港乘上了轮船。

到了上海,各住各处,互不问对方住址。陈住亲友家,吕住自己家,我住小洪处。预约好返浙东之前,陈与我见一次面。

那天,在北四川路的一爿茶馆店门前的人行道上见面交谈。陈说为了治鼻窦炎,还需要住一段时间,不能立即就走。还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我立即反映给党中央,立等回音。这事,就是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要同我方接洽起义。

这样重大而又紧急的事情,革命的责任心鼓励我自觉地承担起向中央反映的任务,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回浙东向顾报告,估计浙东不一定与中央有直接联系,如果再叫我向华中反映,那么往返要延误时间。反复思考,最快的办法还是我冒险再去一次苏北,而且必须我亲自去。虽然明知有危险,为了革命就顾不得这许多了。我把吕留在上海,独自上路了。

三上苏北

这次上苏北不是顾给的任务,是“计划”外的。那时,大概是1948年的10月下旬。我仍旧过青龙港走向汤家镇。这次过“阴阳界”还算顺利,找到启东县委,要到“通行证明书”和九地委机关的地址。一路加快步子,争取时间。找到曾在华中土地会议上见过面的地委副书记王野翔同志(解放后,在江苏省委工作)我要求他解决两个问题:1 我把已起草好的电报稿交给王,要求速报华中工委转报中央。并说明我赶来华中听答示。2 要求借辆

自行车给我,以便争取时间赶到华中。王都同意,找有关同志立即办,办事效率非常高。我骑着那辆边走边坏边修的老爷车赶到淮阴和阜宁之间的王集子村,找到朱志英秘书和欧阳惠林秘书长。得悉我在九地委发出的电报已经收到并已转报中央,还没有答复,要我在此等候。等了许多天,华中工委通知我,这事上面知道了,会设法去办的。我猜想上面通过别的渠道去进行这项工作。我的责任尽了,该回浙东了。

我以为冒了生命危险,为革命做了件有益的事,谁料到21年后的1969年,有人抓住这件事整我,硬说我是从南京浦口进入苏北的。大概他们弄到有人从浦口到苏北而被捕的、他们极感兴趣的资料,把我从青龙港硬是拉扯到浦口给我戴了三年的“大叛徒”帽子。好心没有好报的事天下是有的。事物的运动,有曲折的、直线的,理想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关系到人的事应该事实在前,结论在后。

回头说说,我在华中等待答复和南返途中的一些见闻。已经是11月,苏北冷得早。我穿上了棉军服,戴上棉军帽,和从北面调来的浙东干部同住在华中招待所,其中有薛盛同志两口子 and 潘林儒。有天我与薛盛骑着自行车,上阜宁县城逛逛,看到大批国民党战俘坐在城南晒太阳、聊天,捉白虱,既无解放军管看,也无民兵。于此看到淮海战役的胜利形势、解放区群众的力量。但个别战俘不老实也是有的。我与薛在面店吃完面出店,我的无锁老爷车不见了,估计是俘虏偷的,但他决逃不出解放区的。

南返路上的景象已与北上时大不相同了。可以堂而皇之、昂首阔步地走在大路上了。经过有名的白驹镇,进入刚解放的东台县城,找到在东台财政部门工作的原余姚工作的徐波史同志(潘林儒的爱人)。浙东的老同志在苏北会见倍感亲切。出东台、折向台东滨海小路走,还是找启东县委那位敌工科

长。他根据敌军的情况,叫我别忙着出境,耐心在县委机关等待几天。若干天后,他确信能保证我的安全才通知我出境。这可以看到当时革命同志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对友邻地区同志的关心。果然沿途情况良好,顺利到达上海。

陈子方同志已经自己设法去了浙东,从小洪处获知顾德欢同志上了天台山。我到白道同志家,白派王惠英同志陪我上天台山。说好,分别走路宁波会合。那时船票却很紧张,小洪请小金老大托在北四川路的中国旅行社任职的某人(抗战时浦东游击队员)帮忙,卖到一张六达轮船三等舱对号床位的船票。为了避免麻烦,我故意迟迟不上船,紧临启航前约一刻钟我才上船而且经过观察确信六达码头上船舷旁没有异常迹象。我进入三等舱,找到对号床位刚坐定,突然冒出大批宪兵来进行突击检查。我几次乘轮船,没有碰到过这样临开船前到船舱里检查的情况。想到意外会不会在购票环节上出了毛病?有床位号码、有购票人的身份证姓名。再想想,我们委托的人都是可靠的革命同志不会出卖我的。于是做好应付检查的准备,镇定地坐在床铺上,点上一支香烟,喷吐烟雾,等待检查。宪兵来到我床前,我主动拿出那张冒名顶替的“市民证”,那宪兵很认真反复地审视证件,他看看证件,再看看我的脸,这样反复几次。看脸,无非是“轧苗头”,看我有没有心慌脸变色,察颜观色。看证件无非是看我像不像证件上记载年龄职业,那样,特别是照片,那是重点。的确破绽主要在照片。在苏北华中工委办公室,朱秘书给我上海青年的“市民证”,我把该青年的照片拿下来,贴我的照片,照片旁的半颗图章是原来盖在照片上的,半颗图章是苏北龙王庙刻字匠仿刻的,毛糙的线条我用火柴沾青莲色墨水精心修整的。现场的舱灯是昏暗的,我吸烟喷烟,更添一丝昏暗与镇静。宪兵鉴别不出来,又搜查了我的旅行袋,当然查不到什么。这里可以看到江北淮

海战役打响,江南加强防务,使用宪兵检查宁波轮船我还是碰到第一次,同时说明他们的行动没有特定的具体目标,替我购票的人是可靠的。

翌晨,船到宁波,如约会同王惠英同志,到汽车南站乘上车,经嵊县到新昌,下车以后都是王前我后,步行进入天台境内。在转入右侧大山的山口路上一个大庙前,大约有一个连的敌军坐在地上休息。没想到,进入天台就遇上敌人,大概与我军在台属积极活动有关。好在是大白天,我们都是城市回乡人的打扮在他们身边擦过,大概他们刚从山中出来,很疲劳,眼皮都懒得抬一下,让我们两个“奸匪”就顺利地进入山区。

跟着王惠英到大山腰的一家单独的农户,王问到部队的宿营地,王又领我到部队宿营地,他就悄悄地离去。我向顾德欢同志汇报执行苏北调干任务的情况和黄绍竑联系起义的情况,还谈了苏北见闻,实际上是革命形势的介绍。益林解放,华中机关从射阳河边藕垦小农村搬到合德镇,又从合德搬到靠近两淮的王集子,阜宁有大批国民党军的战俘,回来可以走大路经白驹、东台,韦国清的二纵队长驻华中……。这些给敌后斗争的同志是极大的鼓舞。可惜调干只调到一个陈子方同志,与浙东正在大发展形势的需要相差很大。

这样形势下,南北都需要干部,有些干部暂时不想来敌后,江南解放,只是时间的问题。

临委领导与主力部队从四明山到天台山,浙东的革命局面扩展了。在这里见到不少熟悉的同志,如钢铁部队的指战员们,张任伟、邹明、诸敏等同志,碰到江震同志,话匣打开,讲起来没有完。还有在四明山上见过的浦东人老邹,我们浙东的游击部队一般是不用队旗的,这里看到括苍山游击队队旗,开了眼界。部队转移到华顶寺,白天大部队行军,解放战争时期我幸遇的第一次行军。上海的陈敬之同志这位女大学生也到天台山高峰上来了,随身带来手提箱一只,里面装有重要的电台通讯设备。一位女同志独身上山,送来这样重要而危险的东西,是何等勇敢和机智啊,她送来了“顺风耳、千里眼,”是当时浙东的党、军何等需要的法宝啊,可是一下子还用不上。要南北通报须待我最后一次去苏北,回来那已是1949年的3月中旬。

就在华顶寺里,浙东临委书记顾德欢同志交给我又一次上苏北到华中工委的任务,那是1948年12月,这次出发回来已是1949年3月6日到浙东,大概4月到诸暨陈蔡向顾传达上级指示,关于大军准备渡江,与准备接管城市指示,交出通报信号。

(上接第1页)

消息。有的群众问我,你们为什么不挑毛笋来卖?我说不要怪山里人不来卖毛笋,因每担毛笋要交税10%,所以里山人不挑毛笋来卖了。这个消息一传开,广大群众向镇公所去闹了。镇公所是知道的,这件事是伪军宋庆云军部和广大南货店老板二人搞的,因他们两人是同学关系。又过了四天,仍不见毛笋入市。后来镇长向二个坏家伙要求免税,群众又向镇公所大闹,二家伙同意了。镇长又派另一个人名叫裘阿贵来对我说:“来根弟!为毛笋收税之事,

镇长叫我来讲和,今后山里人的毛笋和山货全不收税了。”我说:“你讲的我同意,可是有这么多的山民叫我通知,至少化二天时间,这怎么办呢,”他又说:“二天工资我负担,给你15斤大米好吗?”我说那好,我去通知。”回家后,我把口信传开,到第二天,六七十担毛笋全入市了。裘市镇广大群众很欢迎。我们罢市斗争胜了。大家都很高兴,并叫我去感谢三五支队对我们指导。事后又向陈爱中同志作了汇报。陈说:“来根,你今后对做人只有斗争,才能胜利呀!”

解放战争时期鄞慈三区对敌斗争的回忆

余文光

(一)

1948年春。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四明根据地第二次“清剿”。上海地下党要输送大批干部到四明山开展敌后革命游击斗争。一月初。我根据党的指示,从上海乘轮船到宁波。又乘长途汽车到丈亭,穿过敌的据点陆家埠进山,经过袁马到达杜徐。在杜徐村后登山。那时四明工委正在这个深山冷岙中召开各县工委领导干部会议。我在一个“公馆”里向四明工委委员、鄞慈县工委书记钱铭岐报到。他亲热地接待了我这个“上海客人”。经他介绍,我又认得了鄞慈县工委委员、鄞慈二区工委书记金声。当时我的工作地下交通员。任务是把上海同志经宁波西门外乘航船,直接护送到鄞西沿山根据地、鄞慈二区。金声还专门为我配备了一个农民党员周利忠和一个“两面派”保长裘明财,又指定二区的林大章协助我工作。经过五个多月时间。我们机敏地避开敌人的搜查,穿过岗哨森严的西门外封锁线,把上海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先施公司、申新九厂、富通印刷厂、人寿保险公司、泰康食品公司,以及医务界、学生界的30多个地下党员,分期分批地全部安全护送到四明山区,由四明工委委员薛驹分配工作,其中有不少“同志”分配在鄞慈县工作。充实了鄞西根据地骨干力量。我完成交通任务后,就在鄞慈县工委三区任区工委书记。

(二)

鄞慈三区包括蜃蛟、章远、横涨、栢社、石碶、藕池等乡和桃源乡一部份。大部份是平原。在这些区域内,有黄古林敌区长胡葆光、凤岙市敌镇长汪裕庭和“保警”中队长唐朝生驻守的二个敌人据点统治着;但在山区,原抗日根据地建岙、南岙、毛夹岙、芝溪岙、章家溪、大雷等等村子都有较好的群众基础。

当时三区干部情况是这样:区长王丰巨,区里干部有杨祥瑞、张宁、钟康、孙瑛、陈方、唐小凤等十几个;还有缪开峰、毛利根等近10个同志组成一个区警卫班;通讯员是马瑞章、何根甫共20多人。

1945年9月三五支队北撤后。鄞西群众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他们迫切盼望三五支队早日回来。三区建立后,我们向广大群众宣传“三五支队回来了”。但是群众的疑虑一下子难以消除。于是全区同志分别到烈军属和积极分子家里去走访,通过他们向群众解说;另外我们每天晚上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子挨家挨户拜访谈心,终于使广大贫雇农较快打消了顾虑,不再对我们不理不睬了。本来夜里敲门门不开,现在只要用小石子向屋顶上一投,石子瓦片上滚动发出响声。他们就知道“三五支队来了”,轻轻地把门打开,热情接待我们进屋。这样,我们从他们那里了解群众的疾苦,也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我们对建岙的党支部加强了联系,这个党支部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坚持下来,在艰苦的岁月里,没有停止过党的活动。支部书